

父亲的一生(上)

廖路明

父亲在北大读书时,恰逢北京解放,他随跟投笔从戎,先后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荣立战功;转业后到一家印厂做校对,特殊年代又被精简回原籍,在老家农村务农23年,其间曾断断续续先后在两所学校当民办教师;年届花甲之时,落实政策,最后安享晚年。父亲一生经历了工农兵学教,这不仅是他个人跌宕起伏人生的真实写照,也多多少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学生时代

父亲六岁发蒙时,上的还是那种带有私塾性质的小学。刚开始成绩有点偏科,曾因算术成绩差,被列入试读生。于是他暗下决心,发奋学习,待小学毕业时名列前茅,此后学习成绩均保持优秀。

抗战爆发后,我老家奉新沦陷。父亲因战乱辍学了四年,在此期间,曾被邀请到本村的初级小学教语文和常识课。待局势平稳一些后,父亲转到在国统区铜鼓开办的赣西北临时中学读初中。抗战胜利后,父亲考入九江的修水中学考入国立南昌一中读高中。

相比之下,学生时代父亲国文功课最好,这从他高中时编写的两副楹联可见一斑。

1946年农历六月初六,父亲的表弟结婚。根据当地的风俗,男方要出一副上联给女方,女方根据上联的内容回一副下联给男方,以示门当户对。例如男方出上联:香车迎淑女,女方出下联:美酒贺新郎;或男方出上联:红妆带结同心结,女方出下联:碧树花开并蒂莲。等等。

父亲的外公想考一考这个在国立

南昌一中读书的外孙的学识水平,就把出上联的任务交给了他。通常情况下,男女双方都是约定俗成,从现有传承下来的结婚对联中分别选择上、下联,走一下形式和程序就完事了。这次父亲偏偏不走寻常路,根据婚庆的实际情况自编了一副上联:三四岁,六六巧逢,正是百年好合。“三四岁”是指民国三十四年即1946年,“六六巧逢”是指结婚的具体日子即六月初六,这两个数字相加刚好是一百。这副上联送出后,据说女方请了周围许多知识渊博人士商量,都无法工整地对出下联。女方没法子,只得将上联退回,请求走寻常路,另出上联。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读高中二年级,此时国共两党刚举行完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父亲用我爷爷的名字“华谦”两字,编写了一副鹤顶格春联:华夏庆重光物我皆春共舞升平歌化日;谦词方可让贤豪为国还希福泽吾民。春联贴出后,得到村里不少文化人的称赞,认为顺民意合民情,发出了百姓的心声。

1947年父亲高中毕业,他随即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在江西的招生考试。这一年北师大大在江西只招了两人,父亲是其中之一。

我的伯父由于忽视身体锻炼,结果英年早逝。学生时代的父亲吸取教训,十分注重全面发展,尤其是体育锻炼。他每天坚持跑步,乒乓球、篮球、排球打得都非常好,同时还注意培养文艺兴趣爱好,箫、笛、口琴等都拿得起来,特别是京胡,不仅能自拉自唱,还不时登台献艺。

尽管祖父通过勤俭持家积攒了一

点薄产,但即使是这样的家庭,那时要供养一个孩子读高中和大学,也是十分艰难的。我经常听姑姑唠叨,说每次父亲开学时,为筹备学费和路费,家里时常要向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借钱,实在凑不齐了,甚至还要卖耕牛和吃饭的口粮。在过去重男轻女严重的年代,为支持兄弟读书,我的两个姑姑从未上过学堂,可怜一辈子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

投笔从戎

1949年初,北京解放,父亲此时正在北师大教育管理体系读二年级。在当时大环境的感召下,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参加解放军,并被编入一野的十九兵团。

参军入伍后,父亲很快随军挥戈西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事,直到1949年9月,部队完成解放宁夏的任务后,才班师西安休整。

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即随军入朝参战,此时第三次战役还没结束。父亲是大学生兵,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期间,他都被安排在兵团政治部的宣传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主要是编发战地新闻报刊,采访、编辑、通联、校对等都干过。

在朝鲜,人生地不熟,办报做新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躲避敌机空袭,父亲他们的工作场所一般都在山洞里。朝鲜雨雪多,山洞里整天水滴不止,严重时还会连滴成线,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特别是冬天,洞内温度下半夜常常在零度以下,一觉醒来,大家鬓发染上了白霜,都成了“白毛男”。

在黑森森的山洞里工作,需要有

强亮度的照明。洞内空气不对流,缺少足够的氧气,汽灯点着点着常常会自行熄灭,只好改用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写稿、检字,不仅十分费力,而且几个小时工作下来,人人鼻下留下了两缕“黑烟印”,俨然像是蓄下的“东洋小胡须”。“白毛男”加上“黑胡须”十分显眼,大家往往相视而笑。

那时的朝鲜有时很难分清前方后方,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晚间,父亲他们正在抢运粮食,突然敌机一颗照明弹下来,接着航空炸弹像雨点般从天而降。在这次空袭中,一块弹片从父亲耳边呼啸而过,险些要了命。痛心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几位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了。

从山洞里印发到全军的“抗美援朝”报刊,及时交流了作战经验,传递了指挥机关的意图,大大鼓舞了士气。父亲常说,他虽然没有在第一线拿钢枪打击敌人,但他用手中的笔当武器,同样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知劳累、不分昼夜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兵团党委表彰了他们的工作精神,给这个团队记了集体三等功,父亲个人也荣立三等功。

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当时的情况,父亲他们并未立即撤离,而是从战时战斗员就地转为和平建设员,一方面继续编印新闻报刊,同时帮助朝鲜开展战后重建工作,直到1956年才随部队离开朝鲜。

父亲军旅生涯八年,经历了西进东征,用他的话说,困难不辞,生命不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和战友们用鲜血和汗水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境的和平稳定作

出了贡献。

印厂做工

从朝鲜回国后,父亲转业到解放军报社印厂车间当工人。由于是工人中的文化人,父亲被安排做校对,并担任校对组组长。

定居北京后,父亲的工作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不久就把我母亲和奶奶、哥哥从江西老家接到北京一起共同生活。一家人在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后终于团聚了。

父亲在印厂工作的前两年,大家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整个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印厂各单位都提出了超高的生产任务指标,你干24小时,我就48小时连轴转,把车间比作战场,生产场面“冲”“杀”之声此起彼伏,所有职工神经持续绷得紧紧的。长时间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感到极度的疲劳,职工中的病号明显多了。此时父亲患上了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

“大跃进”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经济遭遇了三年的严重困难。为减轻城市压力,1961年6月中央发出了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2000万城市工人返乡务农。为完成任务,各单位都分到了具体的精简数量指标。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理所当然”地出现在精简名单中。很快他就接到了通知,全家的商品粮指标下个月停供。没有粮食指标,一家人就会吃不上饭,就得饿肚子。于是,1961年,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原籍老家奉新务农。

小寒节气

甘树林

小寒节气,日子还沉迷在暖融融意象的温存中人们的心灵,丝毫没有感受到季节的凄切与凛冽

没有冰雪覆盖的寂寥没有寂静的惆怅也没有不堪吟咏的憔悴思绪只有走向新年的脚步铿锵

虽然走进了冷寒的季候尘世喧嚣中,并不见思想被冰封,印入眼眸的都是按捺不住的喜悦和律动

寒意或许还会侵袭,只要清醒的是惦念,透彻的是心情灵魂敲出缕缕缕缕诗思将成为对接踵而来的春天的预言

花卉又一簇

彭勃

送走晚霞迎来日出,每个人都在辛苦赶路,三餐四季妻儿父母,追梦的人啊停不下脚步。

柳暗花明山重水复,拨开那迷雾风雨无阻,汗水泪水热血交付,为明天拼一个义无反顾。

世有千般苦勇敢去奔赴,没有青春可以辜负,灯火阑珊处花开又一簇,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深情抵万难真爱解千忧,老天只把强者眷顾,名利皆虚无乞丐也是福,自己的高度自己标注。

诗二首

东方龙

腊八有感

杂粮五谷满砂锅,咸淡浓稠任搅和。腊八来临年已近,回头但愿未蹉跎。

小寒蜡梅

凝云蔽日小寒天,叶落纷飞浸冷泉。一剪梅花疏影处,身披玉雪傲崖边。

家乡

王宇翔

我的家乡,头枕着九岭山的余脉,孕育了官山福地和“三个半屋场”。都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来宜丰走走吧,这里山水相依、一路风光。春天的石花尖,看漫山杜鹃染红天际。夏天的双峰竹海,清风徐徐吹散热浪。秋天的古阳寨,金黄的稻谷压弯了云海梯田。

冬天的天沐温泉,洗净游子满身的疲惫和匆忙。

来宜丰走走,这里历史悠久、文脉绵长。天宝古街的青石板,雕琢着千年岁月。南屏书院的琅琅书声,掠过崇文塔的尖顶,还在这片土地回荡。竹海松林的波涛汹涌,磨砺出革命先辈的铮铮铁骨。站在熊雄故居的廊下,仿佛又听见黄沙大捷的震天声浪。灯火辉煌的公园里,人群熙熙攘攘,夏天聒噪的蝉鸣,让人惦记着街头叫卖的酸梅汤。你看那早出晚归的人们,心中都揣着浅淡的梦想。只是那走街串巷的小小身影,已不复当年的模样。

朋友,来宜丰走走。有禅有意境,有竹有风光,有梦有梦想,有诗有远方。这里有人间烟火、儿女情长,有少小离家时父母的一声声叮嘱,还有那化不开的乡愁和诉不完的衷肠。

诗海泛波

送药

喻建辉

2015年11月,娘突发脑出血,被连夜送往省一附院施行开颅手术。手术很成功。康复后,娘独居于乡下的老屋,至今快十年了。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饭时分,我接到了娘的电话。

娘说:“建伢,我的药吃完了,已经有两三天没吃了。”

我连忙问:“是哪一种药?上个礼拜不是刚给您送去了吗?”娘说:“不是那种,是另外一种叫什么莫什么片的,有几个字我不认得。”

听娘这样说,我知道是“尼莫地平片”,是娘开颅手术后医生开的一种改善脑血管血液循环的药。

娘在电话里接着说:“这种药不用再吃了?反正都有好几天没吃了?”

我说:“肯定是要吃的,您不要着急,我吃完晚饭就去买,明天下午下班后给您送过来。”

娘说:“那要得。”

我在电话里安慰着娘,心里却对娘产生了一丝埋怨——上周刚刚给她老人家送完降血压的药,也没听到她说啊。

吃完晚饭,陪儿子认真完成作业快到九点了,我猛然想起还要给娘买药的事。于是赶紧跑到小区门口的药店,幸好药店还没有关门。

想到自己这记性,我怎么还能埋怨已经77岁且动过开颅手术的老娘呢?我心中充满了愧疚与自责。

节气已近冬至,昼短夜长,气温也比较低。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如约去给娘送药。大概十分钟之后,便到了那个无比熟悉的村庄,此刻沿路的太阳能路灯把整个村庄都照亮了。路到天黑的时候,看见明亮的路灯下,冰冷的暮色中,老娘正拄着拐杖抬头向路口张望着,就像小时候天黑了我们站在大门口翘首企盼父母归来的场景一样。小时候,“无所不能”的父母为我们撑起了整片天空,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如今双亲已经年迈,普普通通的我们却成了他们最大、最有力的依靠。是啊,几十年的光阴匆匆逝去,无情的岁月在不知不觉中把角色进行了互换,各自的心境也已经迥然不同。想到这,我更加心疼老娘了。

看到我停好了车子,娘缓缓走过来,略带担心地问道:“建伢,天都黑了,你怎么才来呀?”

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等了多久,连忙下车回答道:“娘,现在天冷,天黑得早,下班就到这个时候了。您到屋里等我就行,不要站在外面。”

娘说:“不要紧,我就是有点记挂你,快进屋吧。”

我搀扶着娘进了老屋,把买好的药放进了她那个专门装药的袋子里,并仔细检查了一下袋子里的药,在确认每一种药都至少有一个月的量后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简短地陪娘聊了一会儿之后,我便要起身回去。

娘说:“这么晚了,吃了饭再走吧。”

我说:“今天不吃了,还要回去辅导当然写作业呢,等到了周末我们再回来。”

娘听到我要带妻儿来,开心地说:“要得,要得!大家一起回来吃饭。”

娘把我送到门口,再三叮嘱我晚上开车一定要当心,然后就斜靠在门上,看到我开动了车子才进屋去。

我回到高安市区,在小区里刚停稳车子,电话响了。拿起手机一看是娘的电话,我以为娘又忘记了什么,有点紧张地问道:“娘,怎么啦?”

电话那头传来了娘温暖而关切的声音:“建伢,你到家了吗?”

“刚刚到。”我回答道。

“到了就好,没什么事,就是记挂你晚上开车呢。”娘说完就挂了电话。

当心情彻底放松的一刹那,我再也控制不住,感觉到一股暖流直往上升,然后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半个小时的旅程,老娘竟分分钟都在牵挂着我!

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母亲的牵挂与担忧又何须在儿行千里之时,它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即使在网络通信发达到可以打视频电话的今天,可以把“天涯”变成“咫尺”的现在也不例外。

所以,无论你多大,有娘牵挂的日子总是幸福的,心里总是暖乎乎的。因为,娘在,家就在!



“柿柿”如意

北梦(摄)

有关红薯的那些事

杨和春

红薯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种生命关爱另一种生命的媒介。

我对红薯的感情太深了,以至于三言两语无法表达清楚。这种感情来源于那段艰苦岁月的积淀。

对于红薯最初的记忆是在养母家。我的童年是在养母家度过的。那是个天天劳动还难以养活自己的年代,面黄肌瘦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标配共像。红薯才刚拱破地皮,便被眼尖的放牛娃瞄上了。他找来一根小木柴,扒拉几下挖出红薯,在身上随便擦拭几下,就把一个红薯从温暖的土里搬到了更加温暖的肚皮里。

在养母家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一晃就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不断派代表到养母家接我回去读书,先是两个姐姐,然后依次是大哥、二哥、三哥。红薯是招待那一批批接我的亲人的主食。每次,我总会找理由躲起来,让哥哥姐姐们无功而返。最末的一次,被大哥偷袭成功,强硬硬拽地把我拉回了家。小小的我没有能力反抗,只得回到那个陌生的新家,开始上学。

再见了我的养母,再见了我的红薯!在土地承包政策推广到江西的岁月里,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皮,我的父亲新开垦了几块荒地,除了种菜,更多的是种红薯。红薯不择地势不分南北,都能生长成熟。霜降过后,红薯成熟,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每天放学回来,书包刚放下,母亲就催我去地里挖红薯。新开垦的荒地,在父亲辛勤汗水的浇灌下,结出的红薯又多又大。那时我正当少年,挖红薯已经是能手,总能准确找到红薯的老窝,挥动锄头,在空中划一道粗劣的弧线,一窝红薯就出来了。从土里小心翼翼地捧出胖胖的红薯,它们的根须还相连着,纠缠在一起,说着悄悄话,大约是讨论何去何从的话题。迅速地掉粘在红薯身上的泥巴,把它们整齐地码放在土箕里,当我挑着一担红薯,踏上回家的路时,夕阳也正要结束一天的工作,有时候还能偶遇“上晚班”的月光,夕阳或者月光把我原本瘦弱的身子拉得老长老长。

晚饭的主角是红薯。饭后,等待我的虽没有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却有繁重的家务劳动。挖回来的红薯,需要挑水洗干净,还要擦成红薯丝。这需要两个人合作,主一次配合默契,才能完成。在皎洁的月光或者昏黄的灯光下,摆好工具,姐姐唱主角,我做配角,一来二去,在“咔嚓咔嚓”的摩擦声中,红薯丝像水一样不断流出来,流进箩筐里。那绝对是个技术活,太快太慢都不行,得有耐心,还得用力适当。擦完一担红薯,已是月上中天了。

学校的紧张学习生活,回家后的辛苦劳动生活,勾勒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主体轮廓。

与红薯有关的最快乐的时光集中在寒冬腊月。腊月一到,农家人开始为年货而忙碌。当冬日暖阳洒满村庄晒场,赶场的农家人一大早就在晒场上铺好了竹篾晒垫,把刚煮好还散发着热气的红薯片一片片平整地铺在晒垫上。我们的快乐来自一边“喂”着晒垫,一边喂着自己。热乎乎甜蜜蜜的红薯片不仅深得嘴巴的喜欢,更受到饥饿的胃的宠爱。有关红薯的那些事还有很多,农村人离不开红薯,红薯也离不开农村人。